

本書所述的僧人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讀者若要進一步了解叢林僧人如何在二十世紀逐漸消失，也許還要參考《森林回憶錄》。簡單來說，叢林森林的消失，部份是源於政治因素，卡瑪拉特別提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泰國軍方的最大國內敵人是共產黨，從而令軍方產生對叢林內生活者的猜疑，不少村民和僧人，都因此而被目為與共黨勾結而下獄。然而叢林僧人傳統的最大敵人，是都市化的發展，以泰國東北地區為例，在1961年仍有41%的土地是森林，到1988年只餘下14%，今天，對天然森林的砍伐仍一直沒有停止（見是書第九章）。

目前，因叢林的消失，整個叢林僧人傳統已經基本上完結，報章偶有一二叢林僧侶的報導，但只屬於世界奇聞的花邊新聞而已。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with China, 1757-1781.
By YONG LIU.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xxi, 277pp.

劉勇師承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此書是他就讀於荷蘭萊頓大學的博士研究成果，於2007年由荷蘭萊頓的布里爾公司出版。此書正文部分除導論外分為六章。導論即本研究的學術史，簡述了18世紀後半期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茶葉貿易的概貌、前人的研究、本書的研究主旨和框架，以及所利用的藏於荷蘭各大圖書館、檔案館的相關資料。第一、二章探討的是1756年開始籌劃的荷蘭對華貿易機構的重組，即以設在荷蘭本土的「中國委員會」（The China Committee）取代設於海外殖民地巴達維亞的「高等行政機構」（The High Government）和由此開始的荷中貿易直航，以及巴達維亞在這種直航中地位的升降。從第三至第五章，作者將關注的焦點放在荷中這一茶葉貿易新路線的兩端，包括中國內地閩、皖兩省的茶葉種植及廣州一口通商的茶葉供應狀況；在廣州口岸上演的「荷蘭—中國—歐洲其他國家」的三角關係；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在荷蘭本土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銷售狀況。第六章是本書的結論，從18世紀國際關係的角度分析了1757-1781年這段荷蘭對華茶葉貿易「黃金時期」的出現及其衰落的原因。正文幾個部分都緊緊圍繞着該書的主旨，以每章平均20來頁的篇幅展開精簡而實證的討論，思路清晰、惜墨如金，是一本有分量的「小書」。附錄包含11份譯自荷蘭文檔案的資料，內容涉及18世紀中

後期荷中的貴金屬貿易、整體貿易評估；廣州的茶葉供應商，從廣州出口到荷蘭茶葉的種類、數量和價格；從巴達維亞送達荷蘭各省茶葉的數量和價格；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荷蘭各省組織的茶葉拍賣的種類、數量和價格，具體有澤蘭省茶葉拍賣的買家、所購茶葉數量和價格，阿姆斯特丹商品交易所以及該市幾位茶葉經銷商的茶葉賣價；以及當時尼德蘭東、西部地區的平均工資。這11份資料是該書分析立論的重要根據，也為涉及該領域的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一筆豐厚的資源。附錄共85頁，佔該書總篇幅的三分之一，是該書的關鍵組成部分。本書思路清晰、邏輯縝密、結構完善，是劉勇為荷蘭自2000年啟動的TANAP（Towards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這一教育和檔案保存項目提交的一份頗為圓滿的答卷。作為此項目研究成果的編者，包樂史教授的弁言冠於卷首。

閱畢此書，筆者認為此書在學理上有如下三個特色：

第一、立足歷史學科，主旨明確，從時間和空間上將1757-1781年中荷茶葉貿易的這段黃金時期娓娓道來。

經濟史和貿易史研究向來容易走進一個誤區，就是對統計資料的簡單羅列，落得他人「非驢非馬」的譏評。此書附錄的大量統計資料無意中也向我們透露了作者當初也面臨着同一危險。然而作者卻能擺脫這些資料的束縛，這除了他分析和駕馭資料的突出能力外，應當歸結於他對該課題準確的學科定位。既然「史」字當頭，分析在1757-1781年（時間）中荷茶葉貿易如何漸次在中國—巴達維亞—荷蘭—其他歐洲市場等地（空間）展開就成為必要。上述該書各章節的嚴謹安排正是作者這一史學定位和史學思維的反映。探討荷蘭本土的「中國委員會」和巴達維亞的「高等行政機構」在對華茶葉貿易上權力的更迭，以及由此引起的後者貿易地位的升降，並移步換景地從國內到國外追蹤茶葉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過程，這種關注「過程」、追尋「變遷」的取向正是史學研究的精髓所在。不可否認，劉勇在正文中相關段落也插入了大大小小的統計圖表，但這些圖表是應分析的需要而使用，從屬於文中的論述，證與論二者的結合頗為和諧。筆者認為該書的寫作之所以能以清晰的思路一氣呵成，完全在於該書這一明確的史學定位。心中有了時、地、人、事的清晰尺度後，史學家方能如雕塑家那樣，從一方石材中鑿除多餘的東西，還雕像（歷史）原本的面目。

第二、研究圍繞參與中荷茶葉貿易的各機構和人羣展開，以人為本，不落「見路不見人」的窠臼。

國內史學研究中「見路不見人」的極端例子有純粹考證西域陸路、西洋海路貿易路線以及古代國內郵傳驛站的設置等等。雖然這些嚴謹有據的考

證對廓清史實有很大的幫助，但人的因素被忽視，卻有違「人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史學原理。此書下了很大的功夫搜尋活動在這一茶葉貿易航線上的各個機構和人羣。當涉及相關貿易機構時，作者在剖析荷蘭「中國委員會」、巴達維亞「高等行政機構」和廣州「公行」的組織結構之餘，不忘挑選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來展示這些機構相互間的人事往來和辦事程式。劉勇認為雖然巴達維亞「高等行政機構」的茶葉貿易決策權在1757年之後轉移到荷蘭的「中國委員會」，但它仍然為中荷貿易直航作出了貢獻，包括為從荷蘭本土出發的商船提供南洋土貨、貿易資金，補充航海設備和人員，以及代表遠在荷蘭本土的「中國委員會」在危急關頭向駐廣州商務代表發佈指令。而巴達維亞也從中獲得利益，例如從自東徂西回航的商船中獲得所需的中國貨物，以及從亞洲內部的貿易中獲得所需的黃金（主要來自日本）等。在其他章節中，我們也看到荷蘭「中國委員會」、巴達維亞「高等行政機構」對駐廣州商務代表的茶葉採購進行指導和交涉等。作者對人的重視也反映在他將對廣州口岸「荷蘭—中國—歐洲」這一三角關係的討論落實到具體的人物和事件，Hersteller號商船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艘船是荷蘭人從澳門葡萄牙總督手中購得，以替代遭遇海難損毀的荷蘭商船Rijnsburg號。當它試圖開進虎門時，遭到來自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澳門當地海關監督的阻撓。為了爭取早日進港裝貨返航，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商務代表頻頻請示巴達維亞「高等行政機構」，並尋求澳門的葡萄牙議會代表的支持，與中方各級官員交涉。而負責居中斡旋的則是公行總商潘啓官。抽象的國際關係在具體的人事往來中得到清楚的展示。

第三、突破狹隘的貿易路線研究的局限，將視野拓寬到路線兩端的中國內陸產茶地和國外茶葉銷售市場，勇於攻克學界公認的研究難點。

貿易路線的研究不能狹隘地停留在一條線上，應該拓展到由這條路線所連接的國內貨源地和國外商品銷售市場這兩個面的考察，這為中外經濟交流史的研究者所共知。然而由於各種客觀原因，如國內相關資料的缺乏、語言能力的局限和國外相關資料分佈的零散，少有研究能很好地兼顧這兩個面。此書卻為攻克上述諸難點提供了一個頗為成功的示範，即使在研究的過程中，作者也時時遭遇上述困難。由於清初內地產茶區人事活動的記載嚴重缺失，劉勇所能做的就是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所購買的茶葉的品種、品質、數量，結合18世紀中國的社會制度，以及現實的田野調查，來復原當時閩西北和皖南這兩個主要的產茶地，以及從這裏通向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的陸路運輸路線。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茶葉在荷蘭本土的拍賣和零售狀況，作者也利

用相關的荷蘭文檔案和實地考察，合理地復原了這段國內學者鮮知的歷史。例如他用生動的筆觸描繪了消費者（多為家庭主婦）步入茶葉零售店，由店主推薦、進而細嚼茶葉樣品、然後到隔壁廂房品茶茶葉的購買過程。這種在扎實研究基礎上的合理重構不正好陳寅恪「覃思妙想」的史學思維嗎？至於荷蘭茶葉在歐洲市場的再出口，作者主要選取英國這個荷蘭茶葉最大的出口國為例。由於英國政府對主要由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的茶葉收取高額的進口稅，有時竟達100%，這給予荷蘭茶葉向英國走私進口以極大的利潤空間。劉勇不僅向我們展示了荷英之間茶葉再出口的繁榮局面，還探討了由第四次英荷戰爭（1780-1784）和英國抵代稅條例（Commutation Act，1784）的出台而導致的這種再出口的衰落。當然荷蘭茶葉也通過馬斯河、萊茵河向德國的一些公國以及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再出口，其具體狀況如何，則有待相關研究者集思廣益，順着劉勇在書中所展示的研究路徑繼續開拓。

蔡香玉

中山大學歷史系

***Drama Kings: 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 1870-1937.* By JOSHUA GOLDSTE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xi, 371pp.**

*Drama Kings*出版於2007年，作者以社會史、文化史的方法，透視京劇在晚清到日本侵華之前這一時段的變化，以及其背後複雜的社會因素。在這種構想之下，作者在第一部分展現京劇如何被構造（或者說再構造），第二部分則論述京劇成為國劇的過程。前後總共八個章節，從不同側面提出很多富有創見的觀點，以下從四個方面簡述。

首先為對劇場空間／場域的研究。京劇的演出，在清末民初經歷從茶園（teahouse）到劇場（playhouse）的過程。對演出場館的變化蘊含的意義，作者主要從兩個方面表述。其一是戲台上的表演模式。北京茶園演出容許演員「飲場」（即在表演進行時稍微停頓喝一下茶再繼續），不被視為對演出的干擾。然而到了新劇場（playhouse）出現後，由於劇場的燈光只照亮舞台，所有觀眾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此，於是劇場成為賣藝術的地方，舞台就成了一個較為封閉的非真實空間，構成自足的再現王國（regime of representation）。於是「飲場」就會成為演員不夠專業的把柄。同樣地，在台